

这样的情况是常常有的：病人已经生命垂危，家属问医生还有啥法子？医生会说，那你们去弄点中药吃吃看吧。

一些最后不得不放弃治疗，或者告诉家属病人活不过几个月或者几天，最后被中医医治或者暂时延缓生命的有多少？

没有人统计过，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，很多很多！

有人问我中药的分量有多重？我曾经说过，生命的重量就是中药的重量！

中医有个先天不足，就是拿不出具体数据。如果你医治了病人，有人还说你是瞎猫碰上死老鼠。不过今天的文章里头，该有数据的地方，全部都有相关部门的数据放着。

当然，我们老百姓也不大相信数据，我们只晓得你当医生就要会看病，收费要合理。

生了毛病，我以为最好的办法是中西医结合，不要看不起中医，也不要以为中医医生年纪越大越好。一个真正有本事的人，到了40岁，该开的花也开了。

孙医生跟我同岁，虚岁46，他眼睛蛮亮的，记忆力惊人，头发呢，已经一半没有了。为啥？20年来几乎天天要给危重病人看病，压力大不大？

“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”。

孙医生有今天的成就，不是偶然的。 笔者



孙尚见 院长

中药的重量

一

40多年以前，我的中医启蒙老师王麦因想拜天台石桥一个老中医为师，但农村里有手艺只传内不传外，几次登门都被婉言谢绝。有一天，我师傅听说那位医生一病不起，就想去看他，但想来想去拿不出像样的礼物，最后挑了一担野板栗星夜兼程赶往天台。

弥留之际的老中医看到我师傅，感动地说：“你挑这么贵重的礼物来看我，我没有什么可送你的，回去的时候，你就挑一担医书回家吧。”

我生长的磐安县方前镇陈岙村，从中医的角度看，是一块到处长满药材的风水宝地。还没到上学年纪，我就跟着师傅上山采药，再把生药炮制成饮片。15岁开始，隔壁邻居生一些小毛病，我已经能开处方了。1980年，磐安县供销社招药材采购员，我很顺利地考了进去。1986年，我到省供销职工学院深造，选择的专业也是中药材。

二

1991年，省里一个医疗队巡回医疗到我们那里，看到躺在磐安人民医院病床上的我爸爸，一眼就看出：这个病人是肝肿瘤。

我带着爸爸到杭州一家大医院复诊，结果又碰上下乡的那位教授：“来干什么啊？回去吧，不要花冤枉钱了。”再回到磐安，医院就不让我们住院了。医院旁边有个操场，操场边上有棵大杨树，我爸爸只好躺在那棵树下，盐水瓶呢，就挂在树上。

医院开给我们14瓶青霉素，6瓶盐水，越挂，肚子越大，小便却“滴滴哒哒”拉不出来。

我问师傅我爸爸有没有救？他一声不响。

金华市供销社有位朋友听说情况后，打电话来安慰：“你爸爸也就这一两天的事了。”

爸爸生病后，我一直在思考，但就是不敢给爸爸开处方，接到朋友的电话，我想豁出去算了。

我看到的那个医案，病情与我爸爸基本相同。但方子里面一味“旋复花”要不要用，足足犹豫了我一个晚上。

“旋复花”是没有毒性的，但有记载“虚人忌食之，食之如杀人。”爸爸是虚弱到极点的人，用上以后会怎么样？

药煎好后，我叫阿姨送去。心想，如果爸爸今天过不去，就是我的错。因为我采用的是大剂量攻下破瘀的断然措施。

没想到，服药后爸爸的病竟然有所缓解。所以说，在以后的行医中，对那些亲属生了

肿瘤还被一些医院拒之门外的事情，我是很同情很同情的。

三

搞药的人，最后成为医生的不止我一个人。

有一天上班，来了两个天台人，说家中有个弟弟生肿瘤，马上要不行了，他们到我们村里买棺材板。我们村里的人就说：“你们还不如把买棺材板的钱用来买药吃，我们村里孙尚见治这个毛病蛮来事的。”

我一听头就大了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又不是医生！

可第二天，这两个天台人又说：“我们弟弟说了，如果你的药吃了没有效果，他就把药带到棺材里去，绝不怨你！”

开出方子一个星期后，他们又来了，一看到我“孙医师、孙医师”地叫，说弟弟吃了药后，本来一天23个钟头疼，一个钟头不疼，现在倒过来了，一个钟头疼，23个钟头不疼。

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忙的时候，在我的办公室里，会坐着好几批病人。

有一次要开会，领导拉着脸问我们科长：“是开会重要还是看病重要？”科长居然说：“开会重要，看病嘛，也重要。”

有个老太太，在我这里看好了毛病。村里人问她地点，她不认识字啊，只记得“孙医师的门口有两块牌子”，结果人家找来找不到我。

越到后来越不行了。山区的农民，你给他治了毛病，他不仅给你送本鸡、送火腿、送花生、送锦旗，还在我们单位门口放炮仗，时间一长，就连县里的领导都晓得了。

那个时候年轻啊，计划以县供销社、县科委联手开发抗肿瘤药物，名称全部想好了，叫“999中药研究所”，报告打到县政府，领导批示“请卫生局大力支持”，真是万事大吉，我喜滋滋地跑到县卫生局，把批示放到卫生局领导面前。

卫生局领导一点笑脸都没有：“你晓不晓得这样做是违法的？我告诉你，我们注意你很长时间了，你如果继续非法行医，就查处你！”

我一下子就呆在那里了。

但病人来求你，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好，公家的地方不行，我就躲到家里看。

卫生局说话算数，没多久，就同工商部门把我藏在家里的所有药材全部拉到街上，当着群众的面，一把火给点了。

为了这个事，两家单位弄得很不愉快。

四

要想合法行医，首要条件就是要有文凭。

4年以后，我拿着省中医学院成教学院毕业文凭、省卫生厅组织考试的有一技之长医师证书、国家组织统考的执业医师证书去见卫生局领导，他一边翻证书一边笑：“小孙啊，你这样我就放心了，今后好好干！”

读了几年书，好的方面是中医理论系统地学了一遍。但书读多了，胆子就小了。原来治疗白血病，我用砒霜会超过规定量的140倍！读过书以后，砒霜我是碰都不敢碰了。

杭州一家医院和东阳防疫站都来请我。东阳防疫站领导为了留住我，居然把我的铺盖也“抢”到了东阳。

东阳卫生局一位领导听说磐安有个医生看肿瘤有点名气，不相信，专门到病人中去调查，在了解了情况后，对我是非常非常好的。

在东阳的时候，有一位专家每次下来检查工作，都要查我们的处方，我们防疫站呢，总不大肯拿出来。为啥？那个时候我们在治疗肿瘤方面已经有点名气了，万一有人乘机偷走，我们岂不是哑巴吃黄连？

五

1999年，我想到大一点的地方去开家医院，这就是金华艾克医院，主攻方向是用中医治疗肿瘤。

2003年，我们的门诊量超过了4万人次，但刚开出来的时候，别人哪里相信啊，营业额只有300元一天。

中医治疗肿瘤，一般都是作为西医治疗的辅助手段，减轻放、化疗副作用。但我要做的事情，却是要把中医上升到治疗的主要手段上来，否则有什么必要开医院？

我院收治的病人，大部分是经过放疗、化疗、手术后或用其他方法治疗后的晚期病人，很多人体重瘦得50公斤都不到了，色素降到最低限度，有的正处于大量吐血、咳血的危急情况中，有的多日来只靠输血输液活命。就是这样一些危重病人，很多都得到了我们的医治。

现在我们的医院是金华市级医保定点单位、非营利性医院、中国疑难病治疗名医名院、省抗癌协会会员单位、浙江省中医药学会会员单位、金华红十字会会员单位。

2003年我们在杭州西湖区红十字医院设了一个门诊部，里面有个医生的亲戚得了肿瘤，就吃我们的药。他对我们说：“你们是从农村里一点一点做上来的，能进到杭州城里来，一定是有真本事的。”

六

看了近20年肿瘤，经历了无数的失败和挫折，很多经验和教训实际上是用病人的生命换来的。有什么突破那不敢吹牛，但我们确实找到了一条用中医有效治疗肿瘤的路子。

1999年，我把临床效果比较突出的一个组方上报卫生部门，结果表明，这一组方具有抗突变作用。能抗突变，从西医的角度说就是能够治疗肿瘤。

我们还请省里有关部门对一个组方做过5个月的动物实验、药理实验、功能实验。

2002年，我们研制的抗肿瘤产品获得了浙江省优秀科技成果奖。

2003年5月，我去拜见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专家时，跟他讲起我们在治疗肿瘤方面的成果，他很惊讶，但又不会说：“为了验证你说话的真实性，我们要亲自试验。”

试验的样本不准我们提供，是他们亲自派人提取的，一式两份。这一次，总共做了10多项试验。

做这样一个实验，费用要好多万。但当时上海生命科学院的领导说，如果实验结果像我说的那样，收费的事情就再说。实验结果出来后，他们为了表达一种喜悦和敬重，居然派人给我们亲自送了过来。

行医近20年来，一路上走来总会遇到很多帮助我的好人。我想，这是因为大家对中医都怀着一颗爱心的缘故吧。

七

如今病人是越来越多，我们在上海又开办了制药厂，我的时间真的非常紧张。值得庆幸的是，我手把手带出一批助手，在我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已能独当一面，挑起大梁，像武汉的张先珍医师，浙江这边的孙彩珍医师、杨帆医师、曹汛医师等，病人对他们也是信任有加。现在是我不在医院的时候，看病的人不断增多，以前都是冲着我来，现在是冲着我们医院的名声来的，因为助手们开出的方子和我开出的方子一致，所以有的病人病好了后，不仅要和我合影，而且一定要拉着我的助手一起合影。

用药如用兵，来不得半点马虎。所以有一点我始终是清醒的，那就是：我不完全满意的医生，我是不会放在最后处方关上的。

摘自《环球时报》

